

# 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

(加拿大)徐乃力

## 前言

近年来对于抗战军事史的研究,已从个别战役扩展到对抗战时期军事发展全面化的研究。这种趋势在本质方面受到了两种情况的影响。第一种情况是历史观的变化,这是由于政治情势转变所造成。从世界局势来看,十余年来首先是中美关系的解冻,接着是冷战结束,两个超强限武谈判的进展,使世界的主要局势趋向缓和。在同一时期内,海峡两岸的关系亦发生巨大变化,由势不两立的对峙,转变到实质上的三通与和平共存。政治上的逐渐和解,影响到对历史解释与观念的变化,特别是现代史上的一些敏感问题,对抗战战争的看法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过去海峡两岸的出版物,对于抗战的解释都是单一的、绝对的。台湾的史学著作受到国民党传统史观的影响,坚持认为抗战全靠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国军的努力,而共产党只是在扯后腿,谋求自大,毫无抗日的诚意。大陆出版的史书对有关抗战的解释则将重点全放在建立及发展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并以之为击败在华日军的主要力量,而谴责国军腐败,作战不力,及国府领导人抗日意志薄弱,易动摇,甚至趋向妥协或投降。

近年来,这种片面的解释已发生变化。台湾的史学界开始注意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对抗战史料的处理及解释亦较前公允。<sup>①</sup>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亦开始肯定某些国军将领对抗日的贡

①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发以英文所著的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蒋介石的个人档案,一般称为“大溪档”,目前亦由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部分整理出版。

献与牺牲，对国军的抗日承认为“正面战场”，而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发展当作为“敌后作战”，两者相合，则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抗战”，是在爱国情操之下争求民族存亡的斗争。<sup>①</sup>在这一个比较公允及理性化的前提下，史学界同仁对抗战史的研究应抱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可信的史料为基础，作详实而不偏不倚的论述。

第二种情况的变化是近十余年来由于史料及档案的逐渐开放，海内外对民国史的研究均已蔚成风气，够水准的学术性专著陆续问世，但是这些专著以研究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为多，南京政府及抗战时期较少。若从专业史的角度来看，则以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史的著作较多，社会、军事、外交史方面较少。

太平洋战争中的几个主要交战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均对这一段战史有了大量的著作问世，包括档案的出版，重要政、军人物的回忆录，以及详尽的历史分析及争论等等。<sup>②</sup>唯独受到侵略战争祸害最久最深的中国，迄今仍没有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根据档案资料编著的抗战史，使得中国人民在二次大战中艰苦卓绝的贡献未能受到世界上的重视与应有的承认。海内外的中国现代史工作者面临着一项巨大任务。

① 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985年夏对军事博物馆抗战军事史展览的报道（8月14日），以及诸如《血战台儿庄》等表扬国军将士在抗战初期英勇事迹之电影等等。

② 美、英、日各国官方根据档案撰写的二次大战史或太平洋战争史均早在60及70年代问世。与太平洋战争有关的军政人物撰写回忆录者，美国方面有Douglas MacArthur, George Kenney, Joseph Stilwell, Albert Wedemeyer, Claire Chennault, William Halsey等。英国方面有Winston Churchill, Alan Brooke, Bernard Montgomery, Archibald Wreath, Claude Auchinleck等。日本对华战争有关人物撰写回忆录者更多。详尽的分析及争论有：

Henry C. Morgan, *Planning the Defeat of Japan* (1961),  
Kent Greenfield, *American Strategy in World War I, A Reconsideration* (1963),

C.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等等。

由于笔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军事人力研究自有偏爱，觉得198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一本英文著作《军阀时期中国的士兵》所使用的方法及涉及的各项问题，值得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史及军事史的学者作为借鉴。<sup>①</sup>作者黛安娜·拉瑞教授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描述及分析民国时期1911年至1937年中国士兵的生活及对社会的影响。诸如：士兵的来源，在军队中的生活，官与兵的关系，兵与匪的关系等等，均有详尽的叙述，又特别讨论到士兵对平民暴行的根源及社会背景等。拉瑞教授书中所讨论到的很多问题到了抗战时期仍然存在，有相当的延续性。但是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大举入侵，强敌压境，客观的环境变化很大，连带地使中国军队的成份、来源，以及士兵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拉瑞教授书中所描述的军阀时代有了很大的差异。

本文的正文当以讨论抗战时期中国士兵的来源与补充为开端，然后探讨士兵的生活及军队素质的变化，与拉瑞书中所描述的情况作一比较。由于资料及篇幅的限制，本文所讨论者当以抗战时之国军为主。

### 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军事冲突白热化，双方政府虽有意将事件局部化，但谈判无进展。日军增兵攻占平津，至8月初沪战发生，中日之间终于进入全面战争。抗战发生之初，在表面上中国的兵员数目似占优势，国民政府名下约有近两百万现役军人，包括号称8万而实数不超过4.2万人的共军。<sup>②</sup>日本在战争

---

① Diana Lary, *Warlord Soldiers, Chinese Common Soldiers, 1911—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中国兵员数目根据何应钦：《八年抗战》（1982年台北复印本），第23—27页。中共军数目根据海外研究中共史之两书：侯服五：《中共简史》（1973），第54—60页；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Praeger, 1972, p. 271.

爆发之初的常备军，根据日方的资料，人数仅只38万<sup>①</sup>。但是这一表面上的人员优势全是错觉，国军中有半数以上属于各省的地方军，泰半是北伐不彻底所留存下来的军阀部队，与南京的中央政府貌合神离，有不少直至抗战前夕仍与中央军敌对。在日本侵略，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各省地方军受到爱国精神的感召，亦有赴前线作战之壮举，但毕竟派遣的只是部分军队，地方军阀特别是在西南及西北地区者，留下了大部分军队以求自保。因此战争发生以后能受中央调动的军队，不足总数的一半。<sup>②</sup>

中国的军队还有其它的劣势，包括：第一，装备的不足。现代化的战争必须有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洋务运动或是变法图强，均是一连串失败的惨痛经验。从民国创建至抗战前夕，民生工业的发展略具基础，但重工业仍极为微弱。自建的军火工业（兵工厂）只能生产轻武器及弹药，而且亦不够自身的需求。重武器全靠进口，而且来源不一，所以军火的供应成为抗战时期最头痛的问题，中日的军队在装备方面的优劣差距巨大。<sup>③</sup>第二，中国军队的训练不足，特别是第一线的军队损耗以后，补充的新兵随战争时期的拖延，训练愈趋草率，战斗力自无法与日军匹敌。第三，由于军队背景的复杂与不统一，在作战时难以作有效的调度与指挥。

日本在1937年夏虽然常备军数目不多，但是由于实行现代化的征兵制已有60多年的基础，加以军国主义号召下的各级军校的

① 日本常备军在1937年8月的数目根据台湾出版之L.K.Hsu, M.K.Chang,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aipei, 1971, pp.171—175。作者引用日方发表数字。

② 对抗战初期中国军力之分析及内部复杂情况的探讨见齐锡生教授之近著：*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1982, pp. 83—131。

③ 抗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之分析见F. H. H.King,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Bombay, India, 1968, p. 210—220; 中国军火工业之状况见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U.P., 1956, p.99—102。

军事训练，在侵华战争爆发后即颁布动员令，一年以内其军力已扩充至两百万，另有两百五十万人为第一线及第二线补充兵。全部总动员之下的日本的军力可扩充至五百万人左右。即使只有一部分的军力投入中国战场，日军凭其装备及训练的精良，配合其强大的海、空军威力，就使各方面都居于劣势的中国军队难以抵御。<sup>①</sup>

抗战爆发后的最初数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敌，从华北的攻守战至上海会战，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到了1938年中国的战斗兵力已降至100万，兵员的补充乃成为最迫切的需要。<sup>②</sup>中国的军制自从清季以来一向是以志愿当兵的募兵制为基础。民初的军阀时代，中国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快，而士兵的来源主要仍是乡间或城镇的青年，他们为了生活所需而应募当兵。抗战初起时有不少知识青年及海外华侨受了爱国心的驱使而自愿投效军旅，捍卫祖国。另外由于战事而造成了不少难民、散兵、失业青年，及半武装的地方自卫团队，均可受到应募而成为兵源，但是这些兵源毕竟有限，远不够弥补兵员的损失。<sup>③</sup>抗战的延长及激烈化，使国军无法继续募兵填补。战时经济的困难使得国军待遇低落，士兵难求温饱，不再有青年为了生活、待遇而当兵。此外由于战事的激烈，士兵伤亡率高，当兵没有任何安全性，农村青年几乎无人愿意应募当兵。

募兵不足而兵源的补充孔急，战时的国民政府只有出于征兵一途。其实早在国府定都南京后不久，即有征兵的提议及计划，1933年且颁布了“兵役法”，嗣后成立了兵役处（署），但真正征

① 日本有当时世界第三大海军，船只总重190万吨，空军有2700架作战飞机。见台北国防研究院：《抗日战史》，1966，第17—20页。

② F. F. Liu, *Military History*, p.135.

③ 抗战初期动员后备军人及募兵的努力见许高阳编：《国防年鉴》（1969年再版），第36—39页；抗战后期“青年军”的动员见《抗日战史》，第342—343页。收编散兵及地方武装的努力见Tetr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84—101.

兵计划的初步实行是在1936年。首先在长江下游的六个省建立了师管区、团管区两级的兵役机构，每省征集一师新兵，至年底时已征召了五万人。原计划在五年内将征兵制推行于全国，但不及一年抗战爆发，征兵制草创的诸省不久受到战事波及，无法按原计划推行。<sup>①</sup>由于日军的入侵，国府由南京经武汉，而西迁重庆，中国的政治重心西移，在抗战期间国府所征召之壮丁主要来自西南及南方各省。四川居首，被征壮丁约260万，连同湖南、河南、江西等四省共被征近700万，为抗战时期国军征召壮丁总数之半。<sup>②</sup>

国府所推行的征兵制，由于政令不能下达全国，户籍制度之不完善，经费及承办人员训练的不足，本来已极困难。国家若有八至十年的和平安定，或许制度可以逐步改善而推展至全国各省。而事实上战事爆发太快，国府又缺乏紧急应变的能力，征兵制度很快恶化变质。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役政机构不再直接控制、监督，征兵成为各部队，特别是驻防部队补充缺额的手段。而部队的负责军官又往往与地方乡绅、豪富及乡镇保甲长勾结，造成强拉壮丁，受贿替换，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等非法弊端。<sup>③</sup>再则抗战时期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役政及训练新兵机构经费拮据，而主其事之人员往往风纪败坏，贪污舞弊，壮丁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但难得温饱，缺乏医护，又常受虐待毒打。壮丁因病、死、脱逃而造成的人力损失愈来愈高。<sup>④</sup>根据国府官方发布的资料，抗战八年总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其中自然不包括在征拉过程中折损致死的人数。而这一总数中实际送达各部队驻防地报到成为新兵者只有1200万人。<sup>⑤</sup>

① 见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兵役创办史》，1939年，第2—15页。

② 《抗日战史》，第340—343页；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北）1971年，第245—246页。

③ 《抗日战史》，第338—342页；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243页。

④ 何志浩：《国防与兵役论集》，（重庆）1944年，第120—124页。

⑤ 许高阳：《国防年鉴》，第35—38页；《抗日战史》，第340—343页。

就抗战时期中国的人口而论，国府征兵的成绩很差。战时中国的人口数约在4.5亿至4.72亿之间，由于国府政治统一的不完全，在抗战发生时，中央政令能真正下达的地区，以当时的28个省来计算，大概只有半数。<sup>①</sup>以控制的人口数而论，大约只占全国人口的六成至七成<sup>②</sup>；抗战发生后一年多，日军侵占了华北及华中的大部地区，但国府西迁后增强了对西南及西北地区控制，所管辖的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以上，约在2.8亿人左右。根据近代人口学家之研究，中国及役年龄的男子（18—45岁）约为全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18—20%，即5000万至5600万。以八年抗战的总时间计算，壮丁的总数可达7500万以上。<sup>③</sup>然而以国府征召的壮丁实数来计算，中国的“动员率”远远低于二次大战中的其他主要作战国家。中国的“动员率”只有0.4%，日本为1.3%，英国：1.4%，美国：2.4%，苏联：3%，德国：3.8%。<sup>④</sup>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动员率如此低，实由于几种因素造成，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及户籍资料的阙如。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一旦被征召入伍，若无妥善补偿将严重影响家庭生计，造成农民强烈的反感。为征兵而引起的民变到抗战后期已时有所闻。<sup>⑤</sup>户籍资料的缺乏，使征兵的实施

①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及一年即强占东北三省，1933年占热河，1935年占察哈尔的一部及冀北十余县，地方军人控制的省份有新疆、宁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山西、山东、广西。中央的势力于1935年进入贵州，1936年控制广东，1937年进入湖南。

② 人口的估计根据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72.

③ Chen Ta,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 N. Y., 1946; *China Handbook, 1937—1945*, Macmillan, 1947, pp. 287—288.

④ “动员率”的计算是根据每年平均征召服役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见F. F. Liu, *Military History*, pp. 135—136.

⑤ 何志浩：《国防与兵役论集》第160—163页，讨论到在农村推行征兵之种种困难。

困难，且会产生很多流弊。难怪国府在抗战时期改用配额的方法抽壮丁，而无法公平地推行征兵制。第二个重要因素则与战况的发展及战时中国经济的恶化有关。日军入侵华北、华中诸省，俱为人口稠密、国府行政控制较强之地区，这些地区的沦陷自然影响到壮丁的征集。经济恶化使得政府财政短绌、兵役及训练机构经费拮据，加以人员的贪污，对于壮丁的征集、训练、待遇等每况愈下，到了抗战后期，壮丁的折损率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sup>①</sup>农民对于征壮丁谈虎色变，“征兵”与“征粮”乃成为抗战时期国府的两大恶政，对于民心的丧失关系甚大。

### 抗战时期国军素质的变化

国军的历史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1924年的黄埔建军，但是其成熟期是在国府定都南京以后，特别是蒋介石总揽军政大权的30年代。先是在“清共”以后的北伐最后阶段，国民革命军组为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黄埔系的党军及部分粤军组成，指挥权由蒋总司令自兼；第二集团军是由冯玉祥统率的原“国民军”（俗称“西北军”）改编；第三集团军是以阎锡山统率的晋军为主；第四集团军则以李宗仁、白崇禧统率的桂军为主。与之为敌的主要是张作霖麾下的奉军及倒向张氏的一些旧直、皖系统的军队，另外是“八一”建军以后的工农红军。其他的地方军队，主要是西南及西北各省的省军，仍由地方军阀控制，采取观望的中立政策。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虽然奉军败退关外，张作霖暴卒，其他省军都向中央输诚，但中国的基本军事形势未变，东北军在退到

① 征兵的各种弊端在重庆出版的《兵役月刊》上几乎每期均有记载，最详尽的报导见1944年吴锡祺的报告：《征补业务之检讨与展望》，登载于《施政专刊》（1945年11月号），第15—20页。何成濬的“战时日记”，记有1944年8月蒋介石委员长在一次突检时见到新壮丁被虐待之惨状而大怒，立即纠办此事，当时的兵役署长被逮捕枪决。见《传记文学》（台北）第44卷第1期（1984年1月），第129页。



关外后基本上仍保存实力。真正的军队派系实力的消长，发生在1928年国军编遣会议破产以后。从1929年至1931年间一连串的激烈内战，紧跟着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整个东北地区。在张学良统率之下的奉军成为寄人篱下、无家可归的军队，受到蒋的命令，成为“剿共”的一线部队，终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少帅”被囚禁，部分的东北军为红军击溃、收编，其余的改隶国军及各集团军。冯玉祥的西北军早在1930年的“中原会战”失败以后已完全分散，一大部分归顺中央，隶属于宋哲元及韩复榘的队伍则暂时驻扎在河北及山东，成为日本军威进逼之下的缓冲力量。阎锡山的晋军亦在中原会战中受到相当损失，但终能借阎氏的短期下野而保存其实力于山西。桂系的李、白二氏，倒蒋不成，终只能退回广西，力求自保，失去了逐鹿中原的力量。

在击败了所有重要的对手以后，蒋氏所控制的“中央军”一枝独秀，30年代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对日本的侵略步步忍让，而集中注意力“剿共”，另一方面则在寻求外援，从事整训及军备的革新与现代化。南京政府虽能从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零星购得一些飞机、大炮、弹药等，但是军备的革新及军事改革主要的外来助力来自德国。由德国军事专家所组成的顾问团始于30年代初，主要是帮助筹划指挥系统的改组及军事训练的加强，特别是军官的训练。德国军火装备的供应则是通过在贸易协定的方式之下与中国农产品的交换而达成。<sup>①</sup>照1936年拟定的建军计划，首先要以德国为范式训练与装备的20个师，约30万军队，然后在三四年内扩充至60个师，总兵力约55万人。当1937年夏抗战发生时，只有8万军队完成了整训、改组及接受新装备，部分完

① 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军事改革之影响及德国的军火供应见，F.F.Liu, *Military History*, 第7至10章；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1987，第43—89页。及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4.

成的军队总数约有30万人。<sup>①</sup>

由于中国军队的复杂背景及30年代中的情况演化，抗战初期国军的素质与战斗力很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装备及给养条件而论，“中央直系军”的30万队伍，应是全国最好的军队。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西北军及东北军的部队，一部分的西北回军，广东军队，山西军队，再等而下之为云南、四川及其他的省军及为数不少的“杂牌军”。虽然在素质及装备上应该依照上述的次序排列，然而这与抗战前期国军战斗力的表现方面并不完全一致。装备及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确实在“上海会战”的三个月交战中表现优秀，但亦伤亡重大，辎重毁损过半。在其他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部队的英勇事迹，但大致表现平平。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的部队表现甚为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之会战最为人熟知。即使装备简陋恶劣的一些省军部队，亦曾有优良的表现。<sup>②</sup>可见战斗力不完全决定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及指挥官的能力及决心等精神因素亦很重要。

普遍而言，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的伤亡率高得惊人。为了阻挡占有海空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军，中国军方硬拼式的阵地战带来了极高的人力损耗，战争初期中、日军队的伤亡率几乎是10比1。到了1938年以后，战事趋向胶着状态，日军陷于泥足，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拉长了战线，而国军亦逐渐改变战略，采取比较机动的迂回方式，双方军队的伤亡比例才渐接近。到了抗战的后期，国内的战场上约为3比1。印缅战场1944年下半年盟军反攻开始，中国派遣的远征军队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在战胜日军的过程中则往往使日方的伤亡比自己高出数

① F.F.Liu, *Military History* pp.112—113.

② 1938年11月傅作义的晋军战胜日军于绥东。抗战期间川军、滇军及其他省军参战者，军长级以上将领曾有人阵亡。

倍。①

抗战前期中国军队耗损率既如此高，国府只能以配额征兵的办法紧急补充新兵。但是如前所述，壮丁的征集、待遇、训练处处不足，再由于经济恶化，在大量美援未能到达之前，武器及装备窘困已极。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的素质及战斗力急速下降。犹忆在十年前曾与台湾一位研究战史的高级军事教官谈到抗战时军事艰难的情况，彼曾感慨地说：“在抗战初期要挡住日军一师，我方约需三师；到了中期我方约需五师；到了后期我方十个师也不一定挡得住！”②好在日本方面后顾之忧亦很多，一方面与苏联时有冲突，从“张鼓峰事件”到诺门坎的战事，使日本对苏联不得不有相当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与英、美的关系日渐恶化，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军力的一大部分（陆军约100万，海空军的大部）转移到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有四五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直到1944年的春季，由于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逆势，以及盟军的缅北反攻影响到日军在东南亚的侧翼压力，日本在华派遣军受命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一次大进攻，代号为“一号作战”，在8个月的时间内，由河南经湖南、广西、广东，至贵州始折回，长达1500公里。日本总动员的兵力为51万人，国军的抵抗则在这一次锐利的攻势中完全瓦解，先是河南第一战区汤恩伯指挥下的30万军队溃散；继之为“长衡会战”国军的失败，唯一英勇抵抗的表现是坚守衡阳城48日；最后是“桂柳会战”的失败，重庆当局紧急空运部队进援贵州，始将日军挡回。③在同盟国对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日军发动的这一次进攻，充分地暴露了国军的严重弱点，足以证明国军素质的低劣及战斗力的消失，国府受到了国内外的苛责，这对于其领导人物的声

① F.F.Liu, *Military History*, pp.44—145. 中国军队的平均伤亡率为23%，即每四个士兵中有一人伤亡。

② 与台湾“三军大学”军事主任教官韦华上校之谈话，1982年4月。

③ 见拙著《1944年日本‘一号作战’攻势对中国形势的影响》，《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

望，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打击。

## 结 论

在讨论了抗战时期国军的来源、补充、素质及战斗力的变化以后，或可与拉瑞教授所叙述的军阀时代中国的士兵作一比较，以为本文的结论。这两个时期中国的士兵最明显的不同是其来源：军阀时期的士兵泰半由召募而来，由于城乡的人口均有过剩的现象，当兵不但可求温饱，拿薪水，享受一些特权，而且军阀之间的战争杀伤率低，对士兵的生命危险性不高，当兵作为一种职业，可能比农工苦力都要舒服，或更有前途。因此军阀召募军队只要条件不错，不怕没有兵源。抗战时期则情况大变，与日军作战伤亡率、危险性均很高，国家又经济恶化，士兵的待遇大不如前，因此到了1938年后几乎无人应募当兵。战事的紧急逼使政府用抽壮丁来征集新兵，又由于征兵的方法及管理之不健全，产生很多流弊，壮丁的折损率很高，造成了人力上的浪费。

由于同样的情况，士兵在军队中的生活亦大不如前，于是转而取之于民，军队的纪律败坏，鱼肉人民，比军阀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军的败行是造成民心向背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官与兵之间仍如军阀时代一样，具有鸿沟，军官虐待士兵之情况极为普遍，士兵受虐致死或不堪虐待而力求逃亡之事时有所闻。战争造成了大量的难民、散兵及土匪，社会不安宁的程度亦不在军阀时期之下。在军阀时代兵与匪之间区别不大，兵可以流落为匪，而匪亦可受招抚为兵。此种情况到抗战时期仍存在，有很多所谓“地方武力”，亦介乎匪与兵之间。比较更复杂的是，抗战时期有国军的武力，有发展敌后根据地的共军武力，亦有接受日方节制的伪军武力，在华北与华中一带往往交错存在，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未必永远为敌。国军与伪军之间有时甚至暧昧不明，互通款曲。

抗日战争是一次神圣的，为民族争生存、争独立的奋斗，其

间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坚持将这场战争打下来的最沉重的担子是挑在中国普通士兵的肩膀上的。这一两千万的壮丁，多半目不识丁，往往被迫离开家乡亲人，过着艰苦的军中生活，除了敌人的枪炮威胁以外，长官的虐待，疾病的侵袭会随时夺去生命。依靠这样的军队终能坚持博得最后的胜利，实在是20世纪历史上的奇迹。

（作者单位：加拿大纽布伦斯维克大学）

---

## 《宋哲元传》出版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宋哲元传》课题组撰写的《宋哲元传》，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系该课题组在1987年出版的《宋哲元研究》一书基础上，参考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吸取史学界研究成果撰成。

该书突出对宋哲元的人生道路进行探讨，对他的家世渊源、从军经历有新的考订，对其功过是非的历史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陈 中）